

附加信息及其实用价值

——兼评《英汉大词典》的附录

刘凯芳

一 词典的附录是不包括在正文之内的附加信息。它往往与诠释词语关系不大,而是一些诸如地名人、历史年表、度量衡换算、各种符号或标记之类的常识性内容。在逻辑上它们与正文的关系不是很大,如列入正文反有可能破坏词典的整体结构,而以表格、图表等形式列出更能使人一目了然,便于检索。

在词典编纂的实践中,是不是要有附录,或者带有何种附录,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词典编纂者决定的。词典编者在决定采用某一内容作附录时,考虑的自然主要是词典使用者的需要。例如,美国大学词典的服务对象主要是北美高等学校的师生、政府机构工作人员以及其他知识界人士,因此如 Merriam-Webster 和 Random House 等著名出版社出版的大学词典都附有美国、加拿大的高校名录;同时,这类词典又在附录中加进了有关论文写作方式的信息,其内容包括撰写论文时引征有关文献(包括注释、参考书目)的书写格式以及标点、大写、斜体字的运用等各种方便人们写作的参考材料。而在英国出版的著名学生词典如 *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 (OALD) 和 *Longman Dictionary of Contemporary English* (LDOCE) 的附录中,除去地名、教名、度量衡等常

见的内容之外,我们可以看到诸如不规则动词表、数词的读法、构词法、前后缀以及其他一些与英语学习有关的知识。这是因为,这类词典的使用者主要是母语不是英语的学生和他们的教师,对他们来说,这类信息无疑是最需要的。这类学生词典还注意提供一些英美文化背景知识,例如 LDOCE 的第一版率先列出了“家庭关系一览表”,把英美家庭中的亲属关系理得一清二楚,S. I. Landau 称赞它“特别有用,希望所有的单语词典(指各种英语词典——引者)都能附有这样一张表,……因为甚至连英美人对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也往往不甚了然”^[1]。不知是出于何种考虑,LDOCE 的第二版却把这张表删去了。有趣的是 LDOCE 的主要竞争对手 OALD 于 1989 年出第四版时却以图解的形式把它收了进去,不过它只收集了六代直系亲属的纵向关系,对人们觉得最为头痛的亲属间的横向关系如 first cousin, second cousin, first cousin once removed, great-aunt 和 great-niece 等均未提及,似不如 LDOCE 所附的表有用。

由此可见,附录的篇幅虽小,但它对于提高词典的实用性却起着很大的作用。因此,不少著名词典的编者都对附录的编写十分重视,并注意随着语言的发展而不断予以更新,以满足读者的需要。如著名的 *Concise Oxford Dictionary* 在第三版之前是没有附录的。但是,从第四版起即加上了附录,并且随着词典的修订,附录的种类也不断增加,至 1990 年其第八版出版时附录增加到 8 种,其新增内容包括地质时代的划分、英国各县与美国各州名、《圣经》各篇名和世界各国名,第六版附录中的希腊与俄文字母表则被删去。再如比较一下 OALD 的第三版和第四版的附录,我们可以发现第四版删去了常用缩略语、词缀、莎士比亚作品、《圣经》篇名等内容,而代之以家庭关系、军衔、化学元素、公制单位以及多达 15 种的分类图解或地图。在附录之后还有 30 余页的词典使用指南。这些内容,对母语不是英语的外国学生来说,显然是实用多了。

附录可以增强词典的实用性。但这并不意味着附录种类越多,词典质量就越高。何况,一部词典该包括哪些附录并无客观的标准。这从积极方面来说给了词典编者发挥创造性和想像力的余地;从消极方面来说,正因为缺乏统一的标准,某些出版者出于商业利益的需要,会让编者在附录中加进一些可有可无、华而不实的内容,企图以此来提高词典在读者心目中的档次,增加其所谓的“权威性”,吸引读者购买。

因此,尽管词典编者在决定附录的种类和篇幅时有相当大的自由度,但这种自由度也应受到一定的制约。也就是说,在设置附录时,应该分清主次,有所选择,决不是多多益善。在决定取舍标准时,应以词典的编纂目的和服务对象为前提,一切从读者的实际需要出发,既要尽量增加词典的实用价值,又要注意其篇幅有一定的限度,从而在这二者之中寻求平衡。

附录种类如与词典编纂目的不符,则会成为价值不大的冗余信息。例如双语词典作为帮助使用者学习另一种语言的工具书,应该尽可能向使用者提供与源语(译出语)及其文化有关的背景知识,而属于目的语(译入语)的信息则不必多加考虑,免得浪费篇幅,因为使用者并不期望也不大可能到这类词典中检索这种信息。在这方面,台湾远东图书公司于1977年出版的《远东英汉大词典》的附录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它的附录中,除了不规则动词表外,其他如中文数字、中国朝代表、二十四节气表、中国月份名、天干名、地支名、天干地支纪年、二十八宿等完全是中国文化的背景知识,与英语或英美社会文化等丝毫不关,甚至连度量衡换算也以中文为主。把这类显然属于汉英词典收录范围的知识硬塞到英汉词典内,显然有悖于词典的编纂目的。

附录篇幅也应该有适当的控制。顾名思义,附录作为附加信息,不应也不可能取代正文。它在词典中所占的比例不宜过大,否则会本末倒置,有失平衡。如193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综合英汉

大词典》，其附录超过了全书十分之一，就似乎太多了些。当然，附录应占全书篇幅的比例并没有绝对的标准，有些词典把人名、地名、缩略语等内容已收入正文，其附录篇幅就少些。而《综合英汉大词典》篇幅过长的原因是它把同义语辨析、3000 余个中国地名等内容全部收入附录之中。

商务印书馆 1978 年出版的《汉英词典》的附录设计得比较成功。它共有 10 种附录：1. 汉字简化字和繁体字对照表；2. 汉语拼音方案；3. 汉语拼音和威妥玛式拼法音节对照表；4. 汉语拼音声母韵母和国际音标对照表；5. 世界各国、地区、首都（或首府）及货币名称表；6. 中国历史年代简表；7. 化学元素表；8. 度量衡单位简表；9. 天干地支；10. 二十四节气。除去一两项外，这些几乎都是与汉语或中国文化背景有关的知识，基本可以满足读者的期望和检索需求。

此外，近年来我国出版的一些中型或中型偏小的英汉或汉英词典的某些附录也颇具特色。例如台湾黄帝图书公司 1988 年出版的《新知识英汉词典》（此书系根据日本出版的 *New Approach English-Japanese Dictionary* 译成）所收附录 9 种中，除不规则动词表、英语词首词尾外，还列出了 K. K. 与 Jones 音标对照表、美国州名及其首府名、数的读法以及常拼错的词。（不过，本书的二十四节气表似属多余。）而上海译文出版社于 1985 年出版的《当代英汉详解词典》的 4 种附录，以将近 90 页的篇幅相当详尽地介绍了英语的语法简要、标点符号、常用不规则动词和普通英美人名。这些精心设计的附录对英语初学者无疑帮助很大。另如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简明英汉词典》与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的《现代汉英词典》的附录中，也采取了一些英语学生词典如 OALD 和 LDOCE 的做法，分别载有一些词汇分类图解，让读者以直观的形式学习词汇，这是很值得推广的。而在偏重科技内容的《汉英综合词典》（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3）的附录中，除了天干地支、中国

历史年代、二十四节气等内容外，我们可以见到两种很有特色的附录，一是汉语中“以英文、希腊文或数字为词头的常用词条”，如“U 字钢”，“ π 介原子”，“8 字形绷带”等；二是“针灸穴位名称表”。这两种表在其他汉英词典中尚未见到过，它们对于我国科技工作者或者学习中医的外国人无疑是十分有用的。

三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1 年出版的《英汉大词典》的成就有目共睹，确实可以称作是我国双语词典编纂史上的里程碑式的著作。《英汉大词典》的附录也颇具特色，有些内容在其他英汉词典很少或者从未设置的。从总体上说，其中大部分是符合该词典的编辑方针的。但无庸讳言，在我们对有些内容细加推敲之后，也会发现其中不乏可以改进之处。

《英汉大词典》有附录 14 种，共 115 页，占全书篇幅的 2.7%。它们是：1. 英语标点符号、大写及斜体字使用法；2. 英美用词对照；3. 英语词汇能力自测；4. 英、法、德、俄、西班牙语译音表；5. 英语国家语言、文学记事；6. 英美武装力量军衔表；7. 汉字简体繁体检字表；8. 常见日本人姓名拉丁字母拼写法；9. 世界主要城市与北京时差表；10. 世界主要城市间航空距离；11. 图书馆资料使用法；12. 国际长途直拨电话使用法；13. 化学元素表；14. 度量衡表。其中 1、6、13、14 等各项内容，常见于英美词典附录中，无庸细述。

附录 2 涉及英美用语的不同，英美词典往往将此纳入正文之中，《英汉大词典》如今以对照表形式列出，令人一目了然，中国读者检索起来非常方便。附录 3 是 10 种各有 60 个词汇的自测表，“旨在为有志于自学英语的读者自测英语词汇量”。严格说来，它不是对英语词汇本身的诠释，而只是语言学习的一种检测手段。虽然提供这类测试方法在学术上似不如列出常用词汇的使用频率表来得严谨（在主要的英美词典中，我们仅在 *World Book Dictionary* 的“前言”部分中发现有类似功能的项目，但形式不同），但从实用

价值与趣味性方面来看,倒也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试。附录4涉及源语以外的其他四种语言的译音,附录8专门注出日本人姓名的拼写法。这是一般双语词典极少收录的。但是,这两张表对中国读者尤其是从事翻译工作的人员非常有用。长期以来,在我国存在着外语译音比较混乱的情况,其原因之一便是人们常根据英语的发音来拼读一些德、法、西语的词。尤其是日语的人名、地名等专名,一般均以汉字书写,但其发音又与汉语很不相同,因此中国读者在见到英文中的日本人名、地名等专名时,往往束手无策,不知道应该译成什么汉字,这就难免造成错误。汽车牌号“日产”(Nissan)被误译成“尼桑”,就是一例。《英汉大词典》的这一附录可说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这个问题。

附录5共43页,以年表的形式收入了从公元前800年至1991年英语国家语言、文学方面的重要事件,是全书最长的附录。这一附录,对英美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自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对其他读者用处可能就不那么大。笔者以为,语言工具书毕竟不同于文学史专著或者文学词典,无论从知识性还是实用性方面考虑,其内容覆盖面应该尽量宽些。如果附年表的话,应以介绍源语国的历史变革或重要事件为主,从而为读者提供时代背景材料。像这类纯属文学史的内容,却占去这样大的篇幅,令人不免有得不偿失之感。

附录11所提供的图书馆资料使用法也给人以过分专业化的感觉。尤其是前半部分图书卡片和图书馆分类体系似乎只对从事图书馆工作的专业人员才有用。很难设想一般读者会到英汉词典中去查询“中图法”、“杜威十进分类法”和“美国国会图书馆分类法”(就是查了也不一定记得住)。至于其后半部分的“工具书目”,“脚注和书目”等则是美国大学词典常收录的内容。

附录7列出了汉字的简体和繁体,这显然不在英汉词典所需处理的范畴之内。如果说这是为了照顾不懂简体字的海外使用者,

那么,印行一个繁体字本效果岂不是好得多?至于附录 9、10 和 12,也许是最具争议性的。词典编者的苦心或许是认为诸如世界主要城市与北京的时差、世界主要城市间的航空距离以及国际长途直拨电话使用法等都是十分重要的信息,因此附列这几项信息具有很大的实用价值。这自然是不错的。但问题是,把这些信息列入英汉词典是否有越俎代庖之嫌?人们要查号打国际长途电话,首先想到的是电话号码簿,大概不会有什么人想到去查英汉词典,因为在人们的心目中,这不是词典所要解决的问题,而且词典也确实难以担负起此种任务。例如,电话的地区代码这类数据常会因升位或其他原因而变换,这些至关重要的变化只有电讯机构的专门出版物能及时反映,词典是没法做到的。换言之,这一附录缺乏编者在“前言”中强调的“稳定性”,何况附录 12 所列出的城市数目有限,远不能代替专用的电话号码簿。附录 10 中所列世界主要城市间的航空距离数据恐怕至多只是有趣而已,没有多大的实用价值。因为常识告诉我们,这类数据只与从事空运业务的专业人员有关,它远远超出了人们一般的使用范围。相比之下,附录 9 的时差,对中国读者与国外联系来说也许比航空距离数据要实用一些。不过,在实际生活中,时差的推算还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加减问题。编者是否想到,许多西欧国家(包括英国)每年有大半年(从 4 月初至 10 月底)的时间实行夏季时?我国读者在 4 至 10 月间如按词典上提供的时差表来推算一些西欧城市的时间,很可能产生误解。也就是说,词典上所提供的数据只在小半年中有用。因此,无论从学术性还是从实用性考虑,还不如附上一幅以格林尼治时间为基准的带有时区划分的世界地图更具说服力。

除了上文提及的英美历史年表及大事记和世界时区划分图外,在《英汉大词典》这样篇幅的大全本英汉词典的附录中,我们却见不到一些篇幅较小的英语词典或英汉词典的附录所常有的内容,如英国和美国(甚至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的地图以及各

国行政区(如州、郡)的名称及首府,也查不到诸如英美重要节日、英美政府机构简况、世界主要通讯社与报刊名称、英美家庭亲属关系图等。这些内容是经常令中国读者产生困难而需向词典咨询的。因此,这些遗漏是令人遗憾的。不过,瑕不掩瑜,正如上文所述,《英汉大词典》的附录总的说来还是相当成功的,至于存在的一些问题,我们希望修订再版时能有所增删修订,以能更上一层楼,更好地满足广大读者的需要。。

附 注:

[1] Landau S I. *Dictionaries: The Art and Craft of Lexicography*.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84. 116

(厦门大学外文系 361005)

(责任编辑 陆嘉琦)